

两条湘江

■ 黄永

边时，二层小楼里正在进行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。那些关于行军路线、关于战略方向、关于领导权的激烈争论，那些被否定的教条和被重新请回的智慧，透过彩色玻璃窗户，落到这条小湘江的水面上，大概也只是比寻常人家的争吵更严肃些的声音。它不懂什么叫“历史转折”，它只负责流淌——用这种永不冻结的流动，回应着小楼里连续三夜不熄的灯光。那灯光投在暗沉的水面上，碎成点点金斑，随波晃动，仿佛无数个微小的、正在重新拼凑的可能性。

两条江水，同名也同归，都是最终汇入长江，东归大海。它们却在1934年冬到1935年春这个中国革命最寒冷的季节里，分别见证了一次沉重代价与一次关键觉醒。广西的湘江，吞下了错误路线的苦果；遵义的湘江，映照了正确道路的微光。前者是用鲜血画下的沉重问号；后者是以智慧开启的绵长破折号。

那条血染的湘江在问：“还要这样走吗？”

穿过遵义的湘江在答：“路，必须重找。”

于是，历史完成了一次向死而生的交接。湘江之战失利的全部重量，没有消散，而是沉入这支队伍的骨血，被他们背负着，踉跄西行，最终重重地卸在遵义会议那张木桌上。桌上的裂纹，或许就是江底亡魂的指纹。而会议决议，则是从血色教训中析出的——既是对过去的清算，更是对未来的授权。

多年之后，人们给遵义的湘江两岸装点了霓虹，给广西的湘江立起了纪念碑。相隔并不是很远的两条江水，一条在小城中静水深流，一条在史册里血色犹温。游客与凭吊者，各自感受着安详与沉重。很少有人细想，这两条同名之水，曾在历史的关键节点，完成了一场沉默的“对话”。一条江以巨大的牺牲发出警报，另一条江以它不息的水流承载着警报之后的沉思，并给出了转向的坐标。

“木落雁南度，北风江上寒。”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这句诗，仿佛是为1934年冬天的广西北部而写。树叶飘落，鸿雁南飞，而比北风更加彻骨寒的，是从湘江江面上刮来的死亡气息。这条发源于桂北海洋山、北入洞庭湖的江水，在那个早到的寒冬，被数万年年轻红军官兵的鲜血染红。当地的民谣从此改写了词：“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不食湘江鱼。”这不是文学的夸张，是痛到极处的写实——一条江，因为承载了太多的死亡，成了地理意义上的“伤疤”。它的每道波纹里，都蕴藏着未竟的冲锋、中斷的呼吸，以及对“路在何方”绝望的叩问。

一个多月后，红军来到遵义城。一条同样名为湘江的河水，从城中穿过。它从大娄山脉的云顶山奔腾而下，流过遵义城，先入乌江，再汇长江。黔北的冬天湿冷刺骨，这条湘江却从不封冻，始终保持流动的姿态，像一种执拗的、拒绝僵化的追求。此时，比起广西那位满身血污的“兄长”，遵义的湘江显得清瘦而坚韧。它流过黔军师长柏辉章私邸的旁

边，奔向辽阔的大海。这是历史的隐喻：所有支流的牺牲，迷途、抉择与校正，无论经历多少九曲回肠，终是为了汇入那片名为“未来”的广阔天地。

站在今日回望，一条江漫江红透，一条江澄澈如鉴。它们的涛声早已编织进一个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，成为背景里深沉的和弦。那水声至今可闻：一声说“勿忘”，另一声以它永恒的流动说“前行”。

它们昼夜不息奔赴前方的身影，仿佛在诠释一个朴素至理：道路，是试错试出来的；方向，是用牺牲校正出来的。

江水的智慧，无非就是——纵使千回百转，终究向东流去。

感念

娘已经去世20年，许多事情在我的记忆里已渐渐模糊。唯独她两次斥责我的情景，却如凿刻在磐石上的字迹，非但未随岁月风雨冲刷褪色，反而愈发清晰。

一

娘叫赵秀群，1924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北于八村。1938年初，抗日烽火席卷冀中平原，母亲的三叔（我称为三姥爷）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家中的第一位共产党员。他在为八路军筹集粮食时被日军逮捕，因坚贞不屈而被杀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三姥爷被迫为革命烈士，遗骨被移葬在保定烈士陵园。三姥爷的事迹对母亲影响很大。当时，她不顾家人劝阻，毅然扔掉裹脚布，小小年纪就在村里参加革命活动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。

那时，娘的家乡一带是游击区。她先是参加了抗日儿童团，又在15岁时参加了妇救会，16岁就担任了村妇救会的副主任。她曾扎着绑腿，带领姐妹们风风火火地为八路军、游击队做军鞋、送粮食、抬担架、救护伤员……

1942年初，蠡县第四区游击队队长李凤阁带着队员活动到北于八村及周边，打鬼子、杀汉奸。李凤阁就是我的父亲。4月，经人介绍，二人成婚，当时不到20岁的母亲嫁到了蠡县桑园营村。结婚当天，父亲得知日军发动的一个重要据点。她意识到敌人出动了，想了想，猛地扔掉锄头，飞快地往家里跑去。她跑进家门，看到我奶奶正在灶台前熬粥，她一边喊着“鬼子来了，快走”，一边跑进屋。当时3个年幼的小叔、小姑还在炕上睡觉。母亲跳到炕上，猛地掀开他们的被子：“快起来，快跑，鬼子来了！”

娘再回到堂屋，看到奶奶还在灶前收拾东西——可能是舍不得那锅粥。母亲从灶膛里把燃着的柴草和树枝拉出来，“砰砰”几脚踩灭，然后拉拽上我小叔、小姑，带着我奶奶，又随手抓起家里唯一的一件棉袄，冲出门。

傍晚，敌人回去，母亲带着家人回到村里。家里3间房子已经成了废墟。也会在沃血后迎风生长，英雄身中数弹，他献出的热血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花溪。在石头与乱草中，英雄最后一次抬头，目睹了浩瀚星空。



英雄

■ 堆雪

英雄身披夜色，从黎明站起，看到这个世界最大的旭日。英雄是在黄昏时分倒下的，他倒下时，被鲜血浸染成火焰的晚霞，招展成一面面猎猎战旗。

英雄，就是在那一面面战旗的拂动中，缓缓倒下的。由于有火焰和风的托举，英雄倒下的瞬间，比我们想象的要慢要轻。

是的，英雄倒下的过程很慢，英雄，是不容易就那么快地倒下的。英雄倒下之后，我们看见一片沉静的淡蓝色山脉，逐渐自远处的地平线缓缓隆起，那山脉，在抵达我们仰视的高度时才停止生长。

我相信，英雄躺下的地方，那些山的海拔会被重新测量，山中草木。

娘亲教我走正路

■ 李全明

听村里人说，日伪军来村里抓我父亲，抓不到人就恼羞成怒，打人、烧房。村里人还说，幸亏你们跑得快，如果被抓到据点里，能不能活都难说了。

奶奶不停地哭，母亲忍住眼泪，拿着一根烧黑的椽子蹲在她跟前说：“娘，别哭了，再坚持几年，等打跑了鬼子，就好了！”说到这里，母亲把先前抢出的那件棉袄披在奶奶身上，婆媳二人面对废墟，抱头痛哭。后来，母亲和奶奶在院子里搭起了窝棚过活。高阳县的娘家人知道了母亲的情况，叫她回去住。她不去：“我走了，这一家子怎么活！”

二

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，娘和全村人欢欣鼓舞。我奶奶问：“你男人快回来了吧？”

娘有些羞涩地说：“估计快了！”9月的一天，娘和奶奶正在院子里铡草，远处传来说话声。娘抬起头，看到身穿军装、牵着马的父亲与村长沿着小路走来。她高兴地对奶奶说：“他回来了。我不是给你说了，打跑了鬼子就回来！”

父亲一路上与遇到的乡亲们打招呼。他绕过村西的水坑，来到自家院前。他左右看看，愣了一下。家呢？家在哪里？过去家里有3间房，一个牲口棚。虽简陋，但也完整。而眼前却是一片废墟。娘迎到院门口，说了声：“回来了！”接着她便无语，眼里噙着泪水。

父亲看到她破烂的衣裳，不知该说什么。

父亲转头看到院子里站立的奶奶，也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褂子，正用手遮着眼睛上方，往他这边看。抗战期间，奶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悲伤，眼睛早已哭瞎了。

父亲喊了一声：“娘！”奶奶答应了一声：“回来了？”

父亲将战马的缰绳拴在门口一棵老榆树上，走进院子，弯腰进到窝棚。低矮的窝棚里，只有一个锅台和用土坯搭建的临时土炕，还有一床破被子。他掀起瓮盖，看到里面有几斤玉米粒，另外一个瓮是空的。他又弯腰走出窝棚，将几个窝头和一块咸菜从马背上拿下来，递给我奶奶：“娘，这是连长让我带回来的。”奶奶接过来，仔细看看，特别珍惜地放回窝棚。

母亲看看他的灰色军装，问：“（从游击队）到部队了？”

父亲说：“县大队改编，我到了24团，任8连副连长……”

说话间，父亲看到他的3个弟弟妹妹，一人背着一筐草走回来。这3个孩

子，大的十四五岁、小的七八岁。远远看去，像是3个草堆在移动。父亲赶紧上前接过来。他知道，打草卖钱是家里的唯一收入……父亲问了家里和村里的情况，然后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省下的伙食津贴。他看看媳妇，又看看自己的老娘，不知该把钱交给谁。

母亲说：“交给咱娘吧！”父亲就把钱递给我奶奶，又和村长说了几句张罗翻修房子的话。他看看日头，说：“我得走了。”说着，去树边解开马缰绳，一蹶凳子，翻身上马。这时，奶奶突然跑过来，拽住马缰绳说：“你不能走！你看看这个家，怎么活下去？”战马嘶鸣一声，父亲用力拉住马头，低声对奶奶说：“娘，我得回部队。你们再苦几年……”

奶奶多病的身体没有力气，拉不住战马，趑趄一步，但还是没放手。母亲冲上来抱住奶奶，说：“你放开手吧，部队上的事儿大。咱们再坚持几年！”父亲用力一放马头，双腿一夹，一溜烟就跑到老远。看到战马跑远，娘和奶奶坐在地上，放声大哭。她们的哭声，惊动了半个村子。

父亲后来对我说，隐约听到她们的哭声，他不敢回头，他怕一回头，就会崩溃。战马从村边疾驰，上了进青纱帐的小路。父亲在马上，拉着缰绳号啕大哭。但他的战马没有停步。他的老娘、媳妇、弟弟、妹妹们忍饥挨饿，房子也被烧掉……他有太多的内疚。

三

父亲常年在外行军打仗，娘在家担惊受怕。

1949年春天，父亲所属的解放军第63军第188师，参加了太原战役。城市解放后，已经历5次负伤的父亲离开第188师，来到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。娘随军到了太原。

20世纪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，家里的5个孩子，不是在上大学，就是即将上学。父亲在公安部门工作，经常十几天不回家。父亲对娘说：“家里孩子多，你支持我，我就是支持了我的工作。你就不要出去工作了。”从此，娘就成了家庭妇女。

每天晚上，我们围着旧桌子写作业，娘就坐在外屋做衣服、纳鞋底。昏暗的灯光下，娘纳鞋底的声音经常伴随我进入梦乡。后来我成家了才知道，为什么说“吃穿”是小事。5个孩子的衣服和鞋都要娘自己做，这是多大的工作量！

大概是我八九岁那年，有一天，娘把一双新做的布鞋给我。我套上了，不知有什么事儿，鞋没有穿好，趿拉着鞋

就往外跑。脾气一向很好的娘突然喊起来：“把鞋穿好！别趿拉着！”她的发怒使我惊讶。我心里想“至于吗！”随后，我站住脚，将鞋帮提起来，满脸不高兴地跑出门。

娘大声说：“趿拉着鞋，几天就把鞋帮踩坏了。”

娘的斥责，引起我的注意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才注意到，做鞋确实不易。她把家里的破衣烂衫撕开，一层一层抹上浆糊，在门上晾干。然后，在油灯下裁剪，一针一针地纳成鞋底。随后，还要缀上鞋帮、捶打……一双鞋不知要经过多少道工序，才能最终穿到我们的脚上。

1980年2月，父亲病逝。家里像天塌下来了一样。父亲的工资一下子没了，家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，母亲只有每月20多元的遗属补贴。几个孩子还没有工作，也没有成家。家里生活变得很困难，沉重的负担压在母亲肩上。仿佛一夜之间，母亲脸上就爬满了密密的皱纹。从那时起，母亲的头发失去了光泽，缕缕银发掺杂在其中。20世纪80年代，她先后将4个儿子送去参军……后来，家境在母亲的操持下，渐渐好转。

90年代初，我已经是某军分区政治部的少校军官。有一段时间，因为爱入下乡工作，母亲帮助我们照看孩子。一天晚上，地方一个熟人带着一位中年妇女来找我，还带着一箱酒。熟人告诉我，他单位的这位女同志的儿子报名参军，请我帮帮忙。我简单问了问，孩子体检、政审已经合格，符合入伍标准。我答应帮忙问一问。临走时，他们硬是把酒放下，表示对我的谢意。他们走后，母亲从屋里领着我的小女儿走出来，严肃地问我：“你收人家礼品了？”

我有点心虚，小声说：“我不要，他们非得放下。值不了多少钱……”

母亲严肃地说：“礼品不能收！家里的东西有多少是多？”

她话语中的严肃与训诫，让我心头一震。第二天一下班，我便用自行车驮着那箱酒，给人送了回去。

转眼间，母亲已经离开我们20年了，我还经常想起这件事。

如今穿鞋时，我偶尔还会不自觉地趿拉一下。倏忽间，母亲的身影便浮现眼前，我立刻警醒，赶紧把鞋穿好、穿正。我会想，再没人这样训斥我了！然而心底涌起的，更多是深沉的思念——母亲让我穿好鞋、走正路，教导我克勤克俭，不奢侈、不浪费。

在后来的几十年军旅生涯中，面对别人送来的礼品，我格外警醒。娘用她对党员的认识，给我划了一道底线。这道底线永远不能逾越。

娘的斥责，我永远记在心里！

只有六个字匆忙发出，“几平安，妈勿念”

岗哨交接时，冰凉的袖口相触，那句“平安”也被冻得坚硬。最实的脚印，留在雪山。最烫的誓言，铸进冰冷的钢铁。当所有母亲掀开锅盖，蒸汽模糊了窗上的冰花，界碑上的红字却更加清晰。

雪继续下，落在去年落过的位置，仿佛时间在此循环。只要士兵站着，昨天、今天和明天，就会连成同一条牢固的边防线。

界碑知道，在这条边防线上，春天，冰雪会融化，有些却是永恒——比如，士兵心底的那抹红。



长征

第6643期



万里一击中 中国画，中国美术馆藏

李苦禅作